

京腔儿的前世今生

—— 150 年来的北京话

上册

而多数下层旗人的汉语水平，也仅限于一
一类旗人知识分子想以小说启蒙下层旗人心智，
白话小说如《小额》一类。《儿女英雄传》以说书人
，又极传神。所用语言是极漂亮、流畅的北京方言。
贵，下至贩夫走卒、妓女流氓，举手投足、只言词组均栩栩
全面、准确地展现了彼时之众生相，尤为可贵的是留下了
真实的十九世纪中叶北京方言的第一手资料，就只差录下音了。
及《春阿氏》均成书于清末“十年新政”时期，这一时期涌
上的新型词汇。除了西方语汇外，更有众多的日语词汇流入。这些
词汇其实也多源于西语，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科技、文艺
等诸多领域。因日文特殊性，所以这些外来词汇得以毫无滞碍地
进入汉语，水乳交融，沿用至今，且使我们完全不觉得这是外来语。
另有些词汇，虽是古已有之，但在“十年新政”期间已被赋予了全新
内涵。还有一些词汇，是此期间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而特创出来的，属
于前所未有的，且在其后沿用下来，流传至今，已经成为现代汉语不可或
缺的部分。了解此类情况，对探讨北京话、乃至汉语整体之发展轨迹，
有所裨益。老舍先生文约词微，志清行廉；文行龙蛇，笔巨如椽；
文小，亦庄亦谐；其指极大，以圣以贤。1900 年庚子之变，先生之
早卫大清国土捐躯；1966 年革文化命，先生为维系文人风骨捐躯。
辱，道循屈子；大星陨兮，文脉衰矣。人杰父子，鬼雄魂魂，
壮哉赫赫。皎然泥而不滓者，与日月争光可也。这种典有序
一段时期内成为全民语言的特殊语汇，正是语言发展演进的
其进行归纳整理，是每一个对本民族语言有责任感者所应
工作今天如果没有人做，不用很久，再过几十年这种

Mandarin

北京市西城区文物保护研究所 编
俞冲 著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笔者在这里以此界定北京话，赞曰：美哉轮矣美哉矣！这除了因笔者自己是京人、聚族于斯已慨忽七旬，难免对其因偏爱而溢美，更因北京话实乃北方语系主流、普通话蓝本、现代汉语基石。以此言之，不为溢美矣。

京腔儿的前世今生 上册

——150年来的北京话

Mandarin

北京市西城区
文物保护研究所 编
俞冲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京腔儿的前世今生: 150 年来的北京话 / 北京市西城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编; 俞冲著. —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5402-4248-0

I. ①京… II. ①北… ②俞… III. ①北京话—研究
IV. ①H17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19751 号

京腔儿的前世今生 —— 150 年来的北京话

封面题字: 弥松颐

责任编辑: 俞 伽 刘朝霞 程 丹

封面设计: 翁 涌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 编: 100054

电话传真: (010) 63587071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1267 千字

印 张: 51

版 次: 201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02-4248-0

定 价: 1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俞冲先生的大著《京腔儿的前世今生——150年来的北京话》可能是现有的首部从语言发展史视角展示北京方言的工具书性质的著作。作者采取的做法，是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末的一系列京味儿文学作品中，遴选出一些具代表性的北京话语汇；并以之为素材，通过归纳整理，展现北京话的风采，力图凸显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北京话的演进脉络，读后令人耳目一新。

本书不同于以往有关北京方言工具书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该书从“动态”的视角出发来进行编撰，而并非以收录词条多寡为胜。这里所谓“动态”，除了前述的“从语言发展史视角展示北京方言”外，更在于不是孤立地罗列与解释某些京语词汇，而是重视其在句中的作用。书中往往通过同一词汇在不同例句即语境中的不同含义，乃至同一词汇在不同语境中的某些语音变异所体现的语义差别，来“动态”地表现京语。

二、本书的另一特点，是对京语的追根溯源。北京地区因中古以来多处于北方少数民族统治下，致使阿尔泰语系对京语的深远影响、产生了所谓“幽燕语”，此类语汇早在七个世纪前的《元曲》中即已出现；而有清一代，满语的强势更是在京语中产生了多量的满汉合璧语汇，乃至在今天的北京话中仍常见其痕迹。另一方面自19世纪后期以来，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增加，英语等西方语言及日语对汉语的影响日益深重；以致我们今天所用的现代汉语中，处处可见中外交流的痕迹。北京作为中外交流的前沿，受外来语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的。另外在20世纪50至70年代、尤其是“文革”期间，又产生了大量富含政治性的时代语汇；而自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又使一大批经济词汇映入了现代人的眼帘。为此本书在正文之外，又特设了

《满蒙语汇》、《元曲语汇》、《外来语汇词条》等专项，便于读者查询参考。

三、本书作者在北京话语音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看法，对北京话语音的构成方式及其原因有着自己的一些独到见解。此类观点作者纯然从一个老北京人的音感出发，不乏参考价值。

四、作者在该书中将19世纪以来的北京话划分为四个阶段的说法，亦是新见。值得语言学界重视。

本书作者并非专业的语言学工作者，但祖辈即居住在北京，是个老北京人。对北京话有着由衷的热爱，多年致力于此，广搜资料，成此巨著，其语料之丰富，解释之准确，令人敬佩。尤其是书中的诸多元曲语汇与今北京话联系起来，多发前人所未发，罗常培先生在给徐嘉瑞先生著的《金元戏曲方言考》写的序中也极力强调此项工作的重要性，俞冲先生的这项成果正是对罗先生呼吁的响应，可喜可贺。

笔者亦是北京人，对北京话有着特殊的感情，今喜见俞先生此书的出版，谨表祝贺，序中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敬请俞先生和广大读者指正。

冯蒸

2016.10.5

绪论：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德经·上士闻道章》），是老子（老聃）对“形而上”境界的描述，笔者在这里以此界定北京话，且赞之曰：美哉轮矣，美哉奂矣！这除了因笔者自己是京人，生于斯歌于斯聚族于斯已倏忽七旬，难免对其因偏爱而溢美之外，更因北京话实乃北方语系主流、普通话蓝本、现代汉语基石。以此言之，不为溢美矣。

本书探索了十九世纪中叶迄今北京话的沿革与嬗变。之所以选定这个时间段，是因为这段时间的北京话清晰地表现出了从相对定型到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交流方式，乃至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剧烈演变的态势。采取的做法，主要是通过选择不同历史时段某部或某人的文学作品（其共同点为均以北京话写成）来统带概括那一时段的语言特点。对相应作品中一些最常见、最基本、最具代表性的北京话语音、词汇、语汇和说法进行整理，标注语音，诠释语义，展现其沿革，探究其本义，从而昭示北京话之发展脉络，帮助读者把握本质，窥其堂奥。进而以此为素材，站在“北京方言发展史”的角度上，分阶段地探究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北京话的演化过程，分析其原因、现状与发展趋势。

这样一本书当然远远不能概括北京方言，但按前述宗旨与做法认真实施，对研讨北京话庶可有所裨益。

全书分为四卷，各卷内容如下：

一、十九世纪中叶的北京方言：取材于《儿女英雄传》一书。此卷主要反映那一时期北京中上层社会的语言，采取类似字典的形式，以标注原著词条的音、义为主，适当兼顾语境、背景、语源，并及语义的衍生。

二、二十世纪初的北京方言：取材于《小额》及《春阿氏》二书。此卷主要反映那一时期北京中下层社会的语言，采取类似辞典的形式，除对原著词条的解释外，还收集一些相关的百科知识加以诠释。另外，这一时期外来语汇开始流入汉语，本卷对此也有相应的反映。

三、二十世纪前叶至中期的北京方言：取材于老舍《小说全集》与《戏剧全集》。此卷对那一时期的语言有多层次的反映：对传统的北京方言仍采取以辞典形式为主的模式；而对新生的词汇（主要是时代性词汇及外来语词汇）则采取类似百科辞书的模式，目的是厘清此类词条产生的年代、背景、来源及历史作用。

四、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文革”前后）至九十年代前期的北京话：取材于《王朔文集》。王朔作品使用的是一种新型的北京话，此卷以百科辞书模式为主，显示这种新型北京话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如何破茧而出，它的出典、特色、沿革、发展趋势及历史作用。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北京话开始了“泛普通话化网络化”进程，本书中此一阶段的京语暂付阙如，笔者拟另行撰文探讨。

开篇之际，有必要首先明确“北京话”与普通话、北京方言的概念与定义。这三者之间是何关系？这个问题早已有语言学者反复论证。本书基于实用考虑，将其定义为：北京话是一个大系；其子系，一方面是经过官方规范化、为全国所普遍通用的标准语言，即普通话；另一方面是北京地区的原住民所习用的区域性语言，即北京方言（本书中一般称为“京语”）。当然，这个定义仅限于本书范围。

北京话是从哪里来的？它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吗？

话是人说的，不同的语言出自不同的人群；而人群之所以不同，首推民族有别。所以为探讨北京话的源流，有必要简单浏览一下北京地区的民族演变史，讨论其在各个历史时段直至今天对语言的影响。

北京作为历史古都，虽自公元前十一世纪即已建都（周初封召公奭于燕，建都于今北京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一带；燕国后来灭邻近的蓟国，遂迁于蓟都，即今北京西南隅），但今天的北京话跟那时可扯不上边儿。

统观中国上古时代，夏商发祥于今之豫西北一带；而周人的文化

来源于商，东周又建都于洛阳，所以三代（夏、商、周）时期通用的是豫西汴洛（汴水、洛河）一带的语言。政治地位决定了汴洛话成为古代的“官话”，即标准语。各地可以有方言，但相互交流尤其是官方的交流，必须有公认的标准语；这是对同一语种、多种方言的一种规范，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与必然。实际中国古代上起商周，中历秦汉，下迄唐宋，官方的标准语音均以汴洛语为基础（秦汉虽建都于关中，但官话大体上仍延续了汴洛语），时间跨度几近三千载，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当然这种标准语是办公或文人社交场合的官话，回家就该各说各话了。

但上述主要是黄河流域的情况（后来也包括长江流域的某些地区），在更靠北的地方，情况就复杂多了。

西汉后期，匈奴产生大分裂，南部匈奴归附汉朝，屯居在朔方、五原、云中一带（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梁素海与呼和浩特市之间）。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汉以王昭君和亲，嫁给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死后，其子复株累若鞮单于沿匈奴旧习续娶之）。这批人内附后，先迁移到西河美稷（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于东汉建安七年（公元202年），再南迁到邺（今河北省临漳县邺镇）。到了四世纪前叶，这批以匈奴人为主，以及鲜卑、羯（亦为匈奴的一支）、氐、羌等北方的少数民族成了气候，于公元304~439年，在长城南北广大地区建立起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秦、北凉等北方少数民族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但这不过是择其要者而言之，其实自公元四世纪初起，战乱频仍，一百三十多年间，北方及巴蜀等地区一共成立过78个短命的局部地区型国家。此一时期的民族战争导致中原汉人大量南迁，史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而这些北方游牧民族在北方地区建国后，因其汉化程度日深，逐渐与汉人同化。他们为增加自己统治权的正统性，往往变着法儿想把自己的身世跟汉人的某位先贤扯上关系，遂不复以己为异族矣。由此可见，匈奴内附

是一件大事，不仅在于其政治意义，更在于民族意义。反映在语言方面，就是这些少数民族多逐渐放弃本民族语言，转操更为先进的汉语；当然反过来说，其母语也对汉语发生相当影响。这是公元四、五世纪时事。此后直到公元581年隋建立前，今河南省以北广大地区多在胡人统治下，这一带的汉语当然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北方胡语（属阿尔泰语系）影响。这样，汉语的另一大流派，即受阿尔泰语影响的北方语系逐渐显露模样，形成了局面。

具体到北京地区，到隋唐时代，这里（时称幽州）虽在汉族中央政权统治下，但具体掌权的地方官吏却仍多沿用胡人。“安史之乱”（公元755~762年）使这一地区陷入空前动荡；此后直至唐朝灭亡，北方广大地区更是多由少数民族出身的人执掌地方军政大权，中央政权对其日益失去实际掌控力。而当地掌权者的语言（阿尔泰语系）也就不可避免地继续对当地的汉语施加相当影响。此后进入五代时期（公元907~960年，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此地的统治者亦多与胡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自公元936年，后唐将领石敬瑭（就是那个被后世称为认贼作父的“儿皇帝”，沙陀族人）将包括今京、津、河北大部及晋北等广大地区的幽云十六州（又称“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公元947年改称辽），北京地区即开始完全置于少数民族统治之下。历经了辽（契丹族）、金（女真族）、元（蒙古族）三朝的统治，中间虽曾在名义上极短暂地归属汉人政权（公元1125年，金与北宋联合灭辽，北宋收复燕云十六州，却旋即于公元1127年复为金所灭），真正由汉族掌权，是430年后的公元1368年明朝建立。汉族在此统治了276年，公元1644年又落到了满族人手里，直至公元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才最终确立了汉族统治权。在公元936~1911年这975年的历史中，北京有695年是在少数民族统治之下，时间占到七成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北京话或推而广之，扩大到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北方语系，就不可能不受到中国北方少数民族语言（阿尔泰语

系)的很大影响。

统观北京作为首都的历史,周代为燕都,辽国为南京(时称“析津府”,是为辽五都之一),金国为中都。因其或为上古、或为异族建立的区域性国家,其官方语言与今天的北京话差异较大或根本不同,不在本书研讨范围之内;元朝统一全国,在此建起马可·波罗笔下美轮美奂的“汗八里”(Cambaluc,意为“王的大城”,即元大都),但官方语言仍以蒙语为主,亦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上述几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朝代,契丹、女真、蒙古人的数量相对较少,老百姓乃至中下层官吏多为汉人,汉语仍应是当时北京地区的一大通用语种。

历史上汉族虽曾多次被少数民族在军事上征服,但因汉文化高于征服者的本体文化,尤其是语言文字远较彼等成熟完善,所以最终结果都是异族统治者的文化被汉文化所征服。在异族统治漫长的七个世纪,生活于此的人民仍多为汉族,所使用的语言主要也还是汉语;而历代少数民族统治者因为在人数、尤其是文化上的劣势,他们其中的多数人逐渐淡化了本民族语言的学习,转习汉语。契丹、女真、蒙古语均属阿尔泰语系(在语言学上属于黏着语),它们的语音、构词、语法与属汉藏语系的汉语(在语言学上属于孤立语)迥然不同;但虽则如此,这一段历史时期北京地区的汉语在阿尔泰语影响下,其语音、语法结构乃至动词的时态表述方式上仍不可避免地某种程度上融进了阿尔泰语系的特色。

学术界一般称自公元311年“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后体现了汴洛语音延续的中原语音为“中原雅音”。一些南方政权国家多以今南京一带为中心建国,故亦将此种语音称“南京官话”,可将其理解为“吸收融汇了当地语音、南京化了的洛阳话”,是为这些南方政权国家的标准国音。

而在北方,有理由认为,早在辽金时期,北京话就已发展成为与南京官话并立的另一种新兴的汉语体系,该体系现多被学术界称为

“幽燕语”，此乃近代北京话源头之一。这种新兴的、以北京地区为中心的方言，与古典汉语即反映了中原雅音特色的“南京官话”逐渐拉开了距离。

这种受到阿尔泰语影响的北方语系，与传统的古典汉语在语音、语调上有很大不同。阿尔泰语是“无声调语”，所以受其影响的北方语系，在语调上较古典汉语大为减少，尤其是操无声调语者最难掌握的入声最终逐渐淡出北京话；另外这种新兴的语系产生了许多适应时代变化的新词汇，包括音译词汇及通过外来语词汇介入演变出的次生词汇，在动词的时态表述方式上更趋多样化，语法结构也吸收了其他语系的长处，使得北方语系更趋完善；尤其是这类新语汇更趋同于北方一般民众口语，较之源于周秦古典汉语、文人化的南京官话更能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现象。上述原因使得这种在日常生活中表述能力更强、相对又简单易学的北方语系后来居上，逐渐演化为中国第一大语系。

元朝学者周德清在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写了一本很重要的语言学著作《中原音韵》，论述了14世纪前叶通行于大都（北京）一带、以有所演变的汴洛语音为基础的元曲曲韵系统（将常用作韵脚的5866个字分为19韵），即所谓“北曲、北音”。但从更广的客观意义上说，它反映了当时北方广大地区通行的、大多数人应用于正常生活中的语音，基本上如实地记录了那时口语语音的主流系统。该书显示出当时的大都话（及以其为代表的北方语系）的主要语音特点已趋近于现代汉语普通话，即：（1）声母不再有清、浊之别；（2）平声分为阴阳两部；（3）入声分别归于他声（当然也有学者不这样认为，如南京师范大学李葆嘉、厦门大学叶宝奎等认为《中原音韵》仍有入声）。这些也基本符合幽燕语的语音特色，与今日之北京话语音已较接近，似应认为元大都话亦是近代北京话源头之一。为此本书选录了元曲中与近、现代北京方言的某些特有语汇在音、义上有传承关系者若

干，以明示此点。但另一方面，这种传承中又蕴含了发展。元曲中“随文生义”（字义无定，因文而生）的现象比比皆是，一个词汇往往语义宽泛，用字混乱；而这些语汇经明清两代厘定，传承至今，已经演变得语义明确、用字稳定，较其源头规范得多了。

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建元洪武，出兵北伐。元顺帝妥懽帖睦尔于公元1368年退出大都（北京）回归漠北，蒙古、色目人等多随扈之。兵燹之后，北京人口锐减九成以上。明初因北平（明永乐年以前北京称北平）人口严重不足，再加以为防御蒙元残余势力入侵，所以开始向北平移民。自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至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仅三十余年间，即从安徽、河南、山西、苏北等地移民十余万户（此后尚有后续者）。可想而知，那时北京的语音可就杂了。

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朱元璋敕令乐韶凤等人编修了一部《洪武正韵》。该书之编撰者多为南人，又是在洪武年定都南京时所撰，反映在书中就又出现了十个以南京官话为代表的江淮语音入声韵部（所谓江淮语音，是由靖康南渡的晋人及偏安临安一隅的宋人带到江南的“中原雅音”演化而来）。南人文化水平较高，他们编的这部韵书也就更多地保留了中古以降的读书音（即“中原雅音”），这种语音与今天的北京话差别较大。明初权贵多为南方人（朱元璋的“淮西集团”），而社会语言在相当程度上又会受到统治阶层所用语言的影响；所以虽然在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立北京为首都（南京成了事实上的陪都），但反映了南京官话语音的“中原雅音”却早已是官方认可的标准语音。自此乃至整个有明一代，官话以“中原雅音”为基础；而北京民间的语言，则又融合了安徽、山西、淮西、苏北、河南等地移民的语音，以及元大都原有的部分语音。

当某一地区内聚集了操多种方言的人群时，其社会语言发展的趋势与规律，一般会趋同于多数民众的口语；而多数民众的口语也必然会与流行于该地区的其他方言产生某种程度的同化。最终的发展

趋势，总会倾向于较简捷、较易掌握的方向，这是在任何一个多种方言语音交汇地区的必然趋势。明初大量聚居于北京的各地移民之语言，经过不断的碰撞融合，当然也会融合产生一种具有明代特色的北京话（这种北京话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这种明代的民间北京话，较之于元代，与今天北京话的差距可能更大。就语言的发展而言，是一种反向过程。

元代的《中原音韵》较明代的《洪武正韵》简捷了些，且当时在北京及其周边地区操“幽燕语”者仍不在少数，所以前者的音韵体系仍会在民间占相当比重。至明朝后期的1606年，北京民间学者徐孝出了一本叫《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的书，该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十七世纪初北京的民间语音，其声韵系统趋近于今天的北京音（无入声），约略类于《中原音韵》，反与《洪武正韵》拉开距离，应即上述原因之结果。

笔者以为近代的北京话源于东北地区，是1644年随着满洲人进京、清朝建立而最终定型的。满洲人发祥于白山黑水之间，操满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追溯他们所说的汉语，应源于早在辽、金、元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与混居在这里的大量汉人所共同创造的幽燕语；后来又向生活在今辽宁、吉林一带的汉族边民（多为山东、河北移民）所学。这些汉人边民最先归附于满洲，是日后“汉军八旗”的重要组成部分。满洲人得天下后，他们口中的汉语语音自然也就成了官方的汉语口语语音；又加上清人入京后将原住内城的居民驱赶到外城（“前三门”，即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外），内城只有满洲、蒙古、汉军旗人居住，拱卫皇城（至清中期才开始有少数汉族高官住进内城）。这样一来，京城的汉语整个大变味儿，由明朝原来以“中原雅音”为基础的南京官话（指官方用语，民间语音受其影响，恐怕也有一定程度的南方语音色彩）一变而为东北话的天下。这种语音，现在学术界有称其为“沈阳音”者，这可能是与清入关前曾

在沈阳定都、且近代以来沈阳地位日重有关。但实际它与今天所谓“苣荳菜味儿”的沈阳语音有较大的不同，而更接近今吉林、长春一带的语音，即所谓“臭糜子味儿”的正宗东北话。

满洲人文化水平总体较低，早期许多官员根本不会汉语，而只能操“国语”（旗人称满语为国语）；除了一些归附的汉族知识分子外，官员人等更不知什么“中原雅音”。所以办公乃至上朝，若是说汉语，自然也就是那一口东北话了。这样实际上从清初开始，通行了三千余年的汴洛语音（“中原雅音”）就从官场上淡出了。但因汉族文人的提倡、部分上层旗人知识分子艳羨汉文化而附庸风雅，以及读书音的存在（如诗词格律就不能按北京音，有一些经典，如《诗经》等，也要求按中古汉语的读书音即“中原雅音”来读），“中原雅音”也还保有一定市场。后来沿科举一途跻身高位的南方士人大量涌聚北京，某些南方语音对京语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北京话语音（以幽燕语为祖语 + 东北话）的正统地位已确立，其主体即内城的旗人汉语语音，似应无疑义。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为规范办公用语，朝廷要求各地官员们学习“官话”——即北京内城旗人所说的汉语。为此刊行了《官音汇解》等标准语教材，南方许多地方还设立了“正音书院”，以推广官话，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中央政府在一定范围内推行某种语言政策。笔者以为兹事体大，甚或不亚于清前期的开疆拓土。一个国家若无一种明确的国家标准语，就可能会埋下日后分崩离析的种子。这绝非危言耸听，像欧洲某些拉丁语系国家，他们其实多有人种学意义上的共系祖先。就血缘关系而言，欧洲某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血缘关系，要比我们这十几亿的汉族某些人相互之间可能更接近（所谓“汉族”，就本质而言，笔者以为更多的是文化共同体，而非血缘共同体）。但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演变成了多个不同的民族国家。究其原因，根本性的一条，笔者以为就是早年间在地理位置上分隔开来的族群之间的语言差异。因为他们采用了表

音文字，其文字（拼音字母）仅为记录语音的符号（不像汉字是所谓的“表意符号”，具有不依附于语音的独立实际意义），所以语音从一开始的小有差异，通过表音文字的强调与明确，逐渐演变为独立的不同语种；在语言差异的基础上进一步自我认同为多个不同民族，从而为多个独立国家的出现奠定了文化基础。以此观之，《官音汇解》这类书的重要性，绝不仅限于在语言学意义上规范语音；推广至文化理念之厘定、民族观念之认同，乃至国体之整合，均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若自公元1728年推出《官音汇解》算起，经过各届中央政府的坚持不懈，北京话成为国家标准语，迄今垂三百年矣。

这种以内城旗人京语为基础的新北京话，自有其语音学及语言学上的优点。首先是其音调总数较少，因而简单易学。如现代北京话有39个韵母，约400个读音，4个声调，音调总数约1300个；而南方语系音调总数均约在3000以上乃至更多。如粤语有51个韵母，有的字甚至有9声，音调总数据说超过5000。另外北京话日常使用的基本字数较少，但却更易于组构新词；动词及其时态因受阿尔泰语系的影响，表现方式较丰富；语法结构更灵活多变；北京话的口腔发音部位较靠前（多为唇齿部位音），说着省力，轻灵流畅等等（本书正文中有具体展现，此处不赘述）。另一方面此种语言又是大多数京人每日每时在用，且与读书音（“中原雅音”）有较大差别，所以后者日渐式微，终至在北京地区完全退出口语范围，而仅保留在某些公事场合及文人圈内。光绪年间，政府在官方用语中进一步大力推行北京口语语音，“中原雅音”的市场更加缩小了；尤可称道者，是清政府学部于公元1911年8月召开中央教育会议，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案》，开始进行“国语运动”，明确北京话的国语地位。虽然清朝旋即灭亡，但国语运动并未受太大影响，民国时期推行国语甚力。自民初相关机构通过表决确立京语的国语地位，至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了注音字母，使得语音的标示从含混的所谓“切

音”进化为科学的注（拼）音，在历史上首次由官方明确提出声母、韵母的概念，确定了由24个声母、15个韵母（民国十一年又增加了一个）构成的国语语音体系；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推广白话文，文言的市场更为缩小，在客观上为彻底摆脱“中原雅音”的羁绊提供了条件，进一步确立了以北京音为基础的北方语系的国语地位；抗战胜利后，面对因日本在台湾统治50年，实施奴化教育，致使相当部分台湾青壮年已经不会说汉语了的情况，国民政府派出了以魏建功先生为主委的“台湾国语会”，在台湾开始推行以北平话为标准、由齐铁恨先生每天在广播电台主播的国语教育；1955年，中央政府开始大力开展普通话运动，这是继公元1728年清政府出台《官音汇解》以后，再一次对国家标准语音的整合与推广，且范围扩大至全体国民，是中国有史以来首次以国家行为在全民中推行某种语言政策，给历届中央政府227年以来（公元1728~1955年）始终坚持如一的国家标准语政策谱写了充实的乐章；至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正式出台，又在技术层面上给普通话以科学性的保障，为这民族的辉煌乐章画上圆满的休止符。上述之伟大进程对中华民族而言，可谓功德无量，善莫大焉。

前已说过，清入关后将内城之原住民驱至外城；又按“内朝外市”之模式，将商业区集中于外城。各地经商者云集于此，如其中经营钱庄粮行者多为晋人，经营布疋饭庄者多为鲁人，经营笔墨纸砚文具者多为皖人，经营茶叶丝绸织物者多为吴越人；至于小本营生，乃至杂役苦力人等，则多为京城近畿（如京东八县、保定河间等地）之人。故而外城是天南地北、商贾云集、九流三教、鱼龙混杂的地方；其居民多有外来户，并非祖籍京人。这就必然造成外城人南腔北调，不若内城京语（旗人京语）纯正。至清中晚期，违背经济规律的“内朝外市”之分日淆，外城人员多有进入内城居住、经商者，遂逐渐融于京人。他们的方言，也多有融入京语，成为京语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京城的各类文艺活动对近代京语的影响亦不可小觑。清代的